

石，“必不堪久”，令“围垣以土坚筑，门楼以砖包而可承重”，但又顾虑工费太大，一、二年内很难完工。于是又谕令先筑南城，俟南城筑完以后再量情酌定^①。

根据这道谕旨，施工顺序立即作了更改：即当南城的東西两道城墙，筑到与崇文、正阳、宣武三门的城墙相齐时，就不再向北延筑，而是东墙折而向西，西墙折而向东，分别与旧城的东南角和西南角相接，这样，北京城的平面图便成了“凸”形形状。

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，兴工仅七个月，整个南城就全部筑完。但城体下部，仍是夯土结构。以后，因财力枯竭，且在嘉靖三十六年四月，又发生了大内三殿被毁之灾，朝廷忙于重建三殿，对所剩下的东、北、西三面外城就再也无力构筑。此后直至清朝，也未再行增筑。因此，北京城的“凸”形形状，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之后。

（上接第39页）

玉器、金银器、玻璃器，唯独没有陶瓷器。再如敦煌石窟的大量唐代壁画中，所画唐代人们的生活用品有玉器、漆器、金银器，几乎没有一件瓷器。即使五代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，宴乐时桌上的用具亦多是漆器和金银器，瓷器只有一套温酒的壶。因此，若要提高陶瓷器的地位，必需满足人们追求华美的心理要求。于是，陶瓷工艺努力吸取其它工艺的长处，越窑仿玉器，邢窑仿银器，长沙窑仿金银器，巩县窑仿漆器，唐三彩既仿金银器又仿漆器和染织品等等，而绞胎工艺便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了。它实际上是仿制漆器中的一个独特品种——犀皮漆器。据《柴饰录》载：“犀皮，或作西皮，或犀毗。文有片云、圆花、松鳞诸斑”。这种漆器始于唐，盛于宋，宋时已有专门制作犀皮漆器的漆工作坊。绞胎陶瓷器吸取了犀皮漆器花纹相绞的特点，将其移植到陶瓷工艺中，创造了陶瓷装饰工艺的一个新品种，以

南城建好以后，共开五个正门和两个便门。明世宗亲自为各门定名，即：永定、左安、右安、广渠、广宁和东西便门^②。

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年）一月二十八日，明世宗又纳工部尚书雷礼之请，增筑七门瓮城，并深挖城外护城河。嘉靖四十三年六月，瓮城、城濠全部竣工。竣工之前，开始向南城募民，谕令“官与其地，永不起租”；同时，还禁止七门“税课额外重征诸弊，以通商贾”^③。万历年间，对京师南城再行加固重修^④。

① 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二六四，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，下同。

② 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三六八。

③ 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三九五。

④⑤ 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三九六。

⑥ 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三九七。

⑦ 《明世宗实录》卷四〇三。

⑧ 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五二九。

⑨ 《万历野获编》，“城廓”。

独特的风格去满足当时人们的审美需求。

陶瓷作为商品，随着各窑生产规模的扩大，必然引起市场的竞争。陶瓷工匠为维持生计，适应竞争的需要，必须改革工艺，保证质量，努力创新，这是客观经济规律所决定的。唐代南方越窑的青瓷和北方邢窑的白瓷均以工艺精良名冠天下，其产品不但畅销国内，而且远销国外。其它窑场欲与之竞争，就只有在装饰工艺上创新了。于是，鲁山窑奔放的花釉、巩县窑华丽的三彩、耀州窑流畅的黑彩、长沙窑斑斓的釉下彩等崭新的装饰工艺品种，便纷纷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出现了，而仿犀皮漆器的绞胎陶瓷装饰工艺只是其中之一。因此，它是在种族、环境、时代等诸因素制约下艺术发展的必然产物。

① 关双喜、刘向群《唐杨谏臣墓出土的几件文物》，《文博》1985年第4期。

② 《中国陶瓷史》，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。